

# 手機與社會關係建構

● 蓋博、楊伯淑

## 一 引言

社會結構的變遷是中國社會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其中社會網絡的視角尤其盛行<sup>①</sup>。該視角體現為一種「關係結構觀」，側重的是社會關係模式，即處於不同或相同社會群體之中個體之間的交往過程<sup>②</sup>，這種觀點呼應了格蘭諾維特 (Mark Granovetter) 的「嵌入性」(embeddedness) 理論，認定社會行為和制度受到社會關係的影響，即嵌入在社會人際關係網絡之中<sup>③</sup>。從社會關係的角度對社會結構進行解剖，已經成為社會學的主流之一<sup>④</sup>。

在傳播學領域，社會關係網絡的建構表現為人際間交往和傳播的過程。隨着通訊技術的發展，手機正在成為新興的人際傳播工具。手機創造了新的社會交往情境，隨之可能帶來社會個體交往行為的變化。考慮到手機在中國的普及現狀<sup>⑤</sup>，本文從媒介研究出發，融入了社會學的視角，研究了手機在社會結構變遷中的作用。由於手機具有移動、便攜等特徵，我

們着重研究這種新型傳播工具對不同社會關係的強化或弱化作用，以及可能給社會結構帶來的衝擊。

具體來說，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的方法，調查對象為18名手機使用者，限定為北京常住人口。考慮到高校學生屬於相對特殊的群體，因此暫不包括在調查對象之內。我們將18份訪談錄音整理為文字，然後根據這些書面數據，進行編碼和比較分析。我們借鑒了社會網絡分析融合階層分析的觀點，引入年齡、性別、收入等社會統計學特徵，以此為框架對受訪者進行比較分析。受訪者被分成3組，分別為青年組 (21-33歲)、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中年組，以及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中年組。

在傳播學領域，社會關係網絡的建構表現為人際間交往和傳播的過程。隨着通訊技術的發展，手機正在成為新興的人際傳播工具。手機創造了新的社會交往情境，隨之可能帶來社會個體交往行為的變化。

## 二 相關文獻回顧：從「網絡化的個人主義」談起

互聯網和手機這兩種新媒介的擴散被認為進一步瓦解了傳統的時空概

手機瓦解了傳統的時空概念，顛覆以家庭或組織為初始單元的傳播模式，使個體超越時空束縛直接成為各自社會網絡的中心節點，促成「網絡化的個人主義」的興起。

念<sup>⑥</sup>，顛覆了以家庭或組織為初始單元的傳播模式，使個體超越時空束縛直接成為各自社會網絡的中心節點，促成了「網絡化的個人主義」(networked individualism)的興起<sup>⑦</sup>，使「個人對個人的連接」成為社會的主流連接模式，掀起了「真正的個人化社區」，個體「通過各自的社會網絡獲取信息、協作、秩序、支持、社交和歸屬感」，社會網絡呈現出個人化的趨勢<sup>⑧</sup>。

在這場社會結構的變革中，互聯網和手機的作用是不可分割、相互補充的。因此，我們需要參考互聯網的相關研究成果。學界在互聯網與現實社區的關係問題上，存在兩種觀點。消極的觀點認為，互聯網對現實生活層面的交往行為具有破壞作用，它使人們逐漸疏離家庭和本土社區<sup>⑨</sup>，更多地投入到以電腦為中介的虛擬社區活動中<sup>⑩</sup>。積極的觀點則指出，互聯網使人們從物理限制中得到解放<sup>⑪</sup>，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互動交流機會<sup>⑫</sup>，加強了個體間的協作<sup>⑬</sup>，鞏固了既有的社會關係<sup>⑭</sup>。

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觀點，分別體現了「網絡化的個人主義」的兩個維度：一方面，家庭和本土社區的弱化趨勢是社會網絡個人化、私人化的側面反映和結果，在新媒體賦予個體跨越物理空間的自由的同时，以物理場所為基礎建立的家庭和本土社會必然會受到相應的衝擊；另一方面，互聯網對社會關係的積極作用是社會網絡擴張的前提和表現，借助新媒介，人們可以和不同的人群進行互動和交流，社會個體擁有更多的選擇和機會。在個人社會網絡橫向擴張、「網絡化的個人主義」抬升的過程中，社會網絡的穩定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其中最主要的體現是社會單元的

進一步細化和瓦解，家庭和本土社區對社會個體的束縛被削弱了。這種辨證關係在客觀上體現了網絡化個人主義「機會和脆弱」<sup>⑮</sup>的二維特徵。

對互聯網持消極觀點的學者認為，人們在網上活動的時間愈長，他們與鄰里的互動就愈少<sup>⑯</sup>。隨着互聯網內化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愈來愈多的研究發現，互聯網不僅有助於弱關係的形成和維繫，同時也鞏固了強關係和親密關係<sup>⑰</sup>。事實上，強關係在新媒體出現之前已經呈現出超越鄰里的特徵<sup>⑱</sup>，而互聯網和手機使人們進一步擺脫了物理束縛，使社會網絡日趨複雜和多元。因此，在探討新媒體與社會關係這個問題時，應當超越簡單的二元範式，從多個角度分析新媒體對現實層面社會交往行為的影響。一些學者已經在針對新媒體傳播行為的研究中，注重既存社會關係的影響<sup>⑲</sup>。我們的研究吸收了這種思路，進一步將手機傳播中涉及的社會關係進行分類比較，以此希望更準確地把握手機在北京居民社會關係建構過程中的作用。

互聯網與手機具有很強的相關性，但是二者也存在明顯的區別。針對手機的研究一致認為，手機加強了個體的社會交往能力，對現實層面的社會關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手機使用者比非手機使用者更善於交際，通過手機上網的用戶明顯比通過個人電腦上網的用戶更多地投入到社交活動中<sup>⑳</sup>，通過手機收發電郵也增強了人們的社交性<sup>㉑</sup>。此外，手機提高了個人在建構社會關係過程中的選擇性<sup>㉒</sup>，維繫和鞏固了已有的社會關係<sup>㉓</sup>，對促進面對面的傳播活動也具有積極的作用。例如，它使人們能夠隨時、隨地約定聚會的時間和地點，也有利於

人們之間的互動協調<sup>29</sup>。值得注意的是，互聯網在中國的使用主要是在辦公地點和家庭等固定場所，而手機則具有更強的移動性，因此有助於將私人空間進一步下放到個人空間，使「個人對個人的連接」內化為我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傳播模式。正如威爾曼 (Barry Wellman) 指出，手機在提供個人對個人的連接上明顯要比個人電腦更進一步<sup>30</sup>。手機的這種個人化連接方式在本質上迎合了社會網絡的個人化趨勢，並預示着「網絡化的個人主義」的興起。

### 三 手機與社會網絡建構

建立社會關係的要素是社會交往行為，而社會交往行為往往置定於特定的社會空間範圍內。空間觀念的轉變通常會直接影響社會關係和社會網絡，使之發生變化。在新媒體出現之前，固定電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會交往活動對物理場所的依賴，促使社會結構由建立在物理空間共存感之上的「小盒子結構」向「全球地方化的社會結構」轉變<sup>31</sup>。這種轉變的核心意義在於進一步解放了社會空間，使人們能夠超越本土社區，利用傳播技術直接與外界聯繫起來。在此基礎上，手機等新媒體的出現，進一步重新定義和劃分了傳播空間，使人們從根本上改變了交往行為和社會關係模式。如前所述，手機傳播增強了社會關係中的個人選擇性。由於個體的社會網絡由家人、朋友、同事等多種關係構成，所謂的選擇性交往具體就體現為手機在維繫這些關係中的使用強度和頻率。

在下文中，我們將逐一分析所調查的北京居民如何利用手機與這些不

同的社會關係進行交往，進而建構和維繫個人的社會網絡。

#### (一) 家庭的視角：家人和親密關係

在手機傳播中，家人間的聯繫佔據着重要的地位。這次調查顯示，父母和子女間的手機傳播幾乎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這類傳播在本質上通常具有表達情感的作用。例如，父母不住在北京的受訪者會定期給異地的父母打電話。這與一些針對外地務工人員的手機調查結果一致<sup>32</sup>。大多數受訪者對基於血緣的這種親密關係都表現出了積極的態度。有的受訪者還與兄弟姐妹、表親、甚至是姑表姻親建立了強關係。

在父母—子女間的手機傳播中，性別不同的受訪者表現出不同的模式。通常情況下，母親和女兒更傾向於主動地維持這種關係，會更積極地與家庭其他成員聯繫，扮演家庭紐帶的角色。在日本的一項手機調查中，全職家庭主婦在維繫家庭關係，特別是父母—子女關係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們通常比男性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與子女交流，包括通過手機進行聯繫<sup>33</sup>。我們的調查發現，儘管受訪者的家庭主要是雙職工模式，母親在這方面的作用仍高於父親，而年輕的女性受訪者也相對更主動地和父母、家人聯繫。

雖然夫妻間與父母—子女間的手機傳播的強度比較相似，但是相較於後者，夫妻間利用手機進行情感表達的程度較低。儘管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說他們會經常和配偶通過手機聯繫，但是他們更多是出於工具性甚至監控的目的，其中又以協調日常家庭

手機傳播增強了社會關係中的個人選擇性。由於個體的社會網絡由家人、朋友、同事等多種關係構成，所謂的選擇性交往具體就體現為手機在維繫這些關係中的使用強度和頻率。

事務為主(例如孩子放學誰去接他／她回家等)。相處比較久的男女朋友之間的手機傳播，也主要以工具性目的為主。一位32歲的銀行會計這樣描述他和交往了五年的女朋友之間在手機使用上的變化：

現在(和女朋友)打電話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聯繫，更多一點，不是以前，以前是一種感情的交流啦，現在可能就事說事兒，溝通的問題，就是一個溝通的工具啦。

相比較，年輕、未婚的受訪者更傾向於利用手機隨時隨地與具親密關係的人士進行情感溝通。而一些單身或離異的受訪者，也利用手機，特別是短信，維繫跨城市的親密關係。手機短信之所以在維繫親密關係中佔據重要地位，不僅因為它的收費標準相對比較低，而且與中國傳統的含蓄型情感表達習慣相關。

儘管短信有助於青年男女之間表達感情，但是訪談也顯示，手機傳播只是發展和鞏固親密關係的一種手段，正如一位27歲的雜誌編輯在訪談中所提到的：

短信(在維繫親密關係中)的功勞只是一部分吧，因為，嗯，像我說發這種，我發這種情感類的這種短信的對象，肯定我跟他們還有其他的方式去做交流，比如說在網上聊天或者說見面聊。那我覺得即使說我們的關係有，怎麼講，有這種進展的話，或者說有任何更親近的趨勢的話，也不僅僅是短信完成的，短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從技術層面上講，手機具有高度的便攜性，使人們可以在任何場所和情況下自由地選擇和外界聯繫。這意味着對家庭空間的挑戰，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對個人的制約作用，這一點在一些已婚受訪者的訪談中表現得尤其明顯。隨着新媒體的出現，家庭的「圍牆」正在逐漸鬆動。

在公共場合，人們得以通過手機與不在場的社會關係進行聯繫，借助手機建立起「對話空間」或者說「內部空間」<sup>②</sup>，公共空間的整體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割裂為以個體為中心的相對獨立的單元。手機這種割裂物理空間的作用不僅體現在公共場所，即使在相對私密的工作場所和家庭空間也發生

手機具有高度的便攜性，使人們可以在任何場所和情況下自由地選擇和外界的聯繫。這意味着對家庭空間的挑戰，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對個人的制約作用。隨着新媒體的出現，家庭的「圍牆」正在逐漸鬆動。



了類似的變化。公共空間私人化的同時，以家庭空間為代表的私人空間也出現了個人化的趨勢。

家庭空間的個人化在更深的層次上彰顯出手機對社會網絡和社會結構的影響。一位41歲的男性已婚受訪者就談到了他和婚外女友如何利用手機保持聯繫：「我們約見面就是先在MSN上說好哪天見面，然後到約定時間了就用手機確認一下，就像今天一樣，發個『我已到』，發個短信。我也告訴她：『我要到了』或『我在路上，請你等會兒』等等。」同樣，他們也會通過手機短信協調網上聊天的時間。

手機、特別是短信服務，通過重新界定私人空間，在客觀上有利於這些婚外親密關係的維繫和發展。手機短信已經被認為屬於隱私的範疇，幾乎所有的已婚受訪者都指出他們從不會查配偶的電話或短信記錄。從這個意義上講，手機的傳播空間逐漸被社會認定為私密空間。在家庭的物理空間內，它為人們與外界不在場的親密關係進行互動提供了可能和方便。儘管手機對生活空間的重新界定並非直接破壞家庭的決定力量，但從宏觀而言，社會個體在家庭中通過手機接聽私人電話和收發短信，正是社會結構日益離散化、社會單元由家庭向個人進一步下放的重要體現。

在比較分析中，我們發現，這種趨勢在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已婚受訪者中尤為明顯，而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已婚受訪者使用手機的頻率明顯低於地位較高的受訪者。在後者為數不多的手機傳播中，也以功能性目的為主。此外，低收入或藍領群體的受訪者也較少有婚外異性朋友和親密關係。一位33歲的自行車修理工這樣描述：

我很少除了老婆之外交異性……倒不是怕老婆，就是沒太習慣，沒有太大必要。因為我在忙活，活啊，出去休息的時間比較少……我這個人是有甚麼都自己扛着，自己負責。不愛跟人說。有的話就是跟老婆說說。畢竟，老婆還是最親的人。

一位43歲的小飯館老闆也表現出類似的情況。對他來說，打手機主要是為了飯館的事兒：「就是買米買油買麵粉啊甚麼的，零零碎碎的事情，你說這也不能算業務吧，為了生存。」

對於這些收入和社會地位偏低的受訪者來講，經濟上的制約和生存的壓力往往使家庭和婚姻成為他們生活的主要支撐力量，是他們在現代化和全球化過程中少有的、可依賴的資源。這種模式與針對農民工的研究結果相對應。有調查顯示，第一代農民工認為滿足家庭的功能性需求是最重要的<sup>⑩</sup>，因此儘管他們的婚姻可能在很長時間處於分居狀態，但是他們鮮有情感問題<sup>⑪</sup>。可見，婚姻狀態在相當意義上與家庭經濟狀況相關，而對於這些在全球化過程中在不同程度上被邊緣化的人群而言，家庭對於其生存的特殊意義，也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家庭空間的個人化趨勢。

## (二) 擴展的社會網絡：好朋友和其他的社會關係

手機強調了個人空間的存在，從一定程度上動搖了社會網絡中家庭的傳統模式和特徵。與此同時，手機的影響也蔓延到家庭之外的社會網絡中。在這部分，我們將從「朋友」的層面出發，探討手機在社會網絡的建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因為「朋友」是

儘管手機對生活空間的重新界定並非直接破壞家庭的決定力量，但從宏觀而言，社會個體在家庭中通過手機接聽私人電話和收發短信，正是社會結構日益離散化、社會單元由家庭向個人進一步下放的重要體現。

對於社會經濟地位比較高的受訪者來說，最好的朋友往往表現為不活躍的強關係。這種現象並不僅是物理距離造成的，更主要的原因在於，這些受訪者通常在工作上投入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並努力拓展個人社會網絡的廣度。

一個比較泛化的概念，所以我們將這類社會關係主要分為以下兩個層次。

### 1、最好的朋友——手機傳播時代的再解讀

首先，讓我們從「最好的朋友」着手分析。在我們的調查中，18位受訪者通常擁有2到3個最要好的朋友，而且多為同性朋友。傳統觀念中，「最好的朋友」應當表現為活躍的強關係，在日常生活中互動的頻率較高。然而根據訪談內容我們發現，對大多數受訪者來說，「最好的朋友」並不一定意味着頻繁地面對面或通過媒介進行溝通，人們與這類強關係的互動總體上呈現出遞減的趨勢。當然，不同的受訪者之間也存在相當的差異。

兩位未婚的男性青年受訪者指出，他們與最好的朋友並不經常聯繫，但是也會在一定時間之內通過電話維繫這種關係。其中一位受訪者這樣理解「最好的朋友」：

好朋友不一定天天打電話，膩膩歪歪的，或者沒事兒逗逗貧甚麼的。可能就是說，你隔一年兩年打起電話來，還是以前那種感覺，就是不生分(的)感覺，這是好朋友。特別好的朋友可能是這種情況……朋友，真是朋友，沒必要說，其實就是有事兒說事兒，沒甚麼事兒別囉嗦，沒那麼囉嗦。

然而，未婚的青年女性受訪者與青年男性表現出明顯的差異。三名未婚的女性受訪者都指出，她們經常和最好的朋友聚會，或者利用電話、手機和網絡彼此聯絡。一位26歲的白領女性指出：

(我和最好的2、3個女友)在MSN上經常見，碰見就說幾句唄……因為MSN

直接就可以聯繫，很快，而且是免費的，而且打字速度要比手機快得多……如果你有急事的話，就發短信吧，不過一般情況下，沒甚麼太急的事。

另外一位27歲的白領則提到了她如何與居住在其他城市的最好的朋友保持聯繫：

(我的好朋友)經常給我發短信……很頻繁……最好的可能基本上每天都聯繫。但是方式可能是MSN啊，或短信……我有兩個每天都短信的那種(最好的朋友)。就是心情的變化，碰到任何事情她都會給我發短信。我基本上每天都知她在哪。不可能說(知道)24小時她都在幹甚麼，但基本知道她在哪，或者生活有甚麼變化，隨時都會知道……(我們主要)還是情感交流……(她們)在車上啊，在機場，火車站，都會發(短信給我)。

這種性別差異在中年組並不明顯，相比較，社會經濟地位是影響中年受訪者與最好的朋友交往頻率的重要因素。整體上講，白領或經濟地位較高的受訪者與最好的朋友進行互動的頻率較低。他們通常只在節假日，或者有事情發生的時候，才同最好的朋友聯繫。

這些受訪者最好的朋友主要是他們的老同學。儘管他們會在一定的周期內通過見面或電話、短信等方式維繫這種關係，但是對於這些社會經濟地位比較高的受訪者來說，最好的朋友往往表現為不活躍的強關係。這種現象並不僅是物理距離造成的，更主要的原因在於，這些受訪者通常在工作上投入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並努力拓展個人社會網絡的廣

度。社會網絡的擴張伴隨着新的、弱關係的出現，而維繫和培養這些「脆弱」的關係往往也佔用了更多的個人資源。

藍領和低收入的中青年受訪者與好友聚會的頻率總體上高於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中年組。一位45歲的小餐館領班認為，「最好的朋友就是常走啊」，這也是這一受訪組的典型看法，所以他們經常會和最好的朋友見面、聊天、「見了面出去溜個彎，然後走走」。這種關係更多地表現出威爾曼所謂的「戶對戶連接」的特徵，即基於物理空間的全方位交往模式。由於有些好朋友住得比較遠，不方便見面，他們更傾向於借助電話定期地跟好朋友進行情感交流。

## 2、比較好的朋友——手機等新媒介的輔助作用

在年輕的受訪者中，除了最好的朋友和家人之外，通常還有大約5、6個比較好的朋友。男性或女性青年受訪者都指出，他們會通過互聯網和手機與這些朋友聯繫，另外，在諸如生日聚會、婚禮、節假日等特殊的場合，他們也會組織見面。然而，由於這些受訪者逐步進入事業的上升期，投入工作的時間、精力日漸增多，所以面對面聚會的機會愈來愈少。一位26歲的白領這樣描述：

(和朋友見面的機會不是很多)……除非我們同學過生日，或者誰結婚了，或者說想聚聚，大家一塊吃頓飯，其他一般都是通過網絡和發短信解決，我覺得現在這是一種趨勢……要是人愈多愈麻煩，然後就要更提前，然後還要協調時間，其實現在大家不愛聚的主要原因就是協調時間太難，你有空他沒空。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青年人更傾向於利用互聯網和手機維繫這些社會關係，在聚會前他們也會選擇利用這些媒介作為協調聚會時間和地點的主要工具。

與青年人相比，中青年受訪者與此類關係見面的時間要更少一些，而且減少的程度與工作狀況密切相關。事實上，對於有穩定工作的中青年受訪者來說，因為「大家都很忙」，所以他們和這種社會關係聚會或聯繫的頻率並不高。除了節假日等特殊場合之外，他們之間利用電話或短信進行溝通也多數出於功能性的目的，比如遇到了甚麼問題，需要這些朋友們幫忙。

隨着現代化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工作忙」已經成為北京城市居民的普遍生活狀態，甚至被默認為大都市的生活方式。即使居住在同一個城市，由於生活節奏緊張，朋友見面、聚會也逐漸成為相對奢侈的休閒方式。以受訪者為例，他們即使休閒聚會，在很多情況下也是選擇比較要好的同事，因為協調起來更容易，這在客觀上加強了同事關係，是辦公室文化向日常休閒生活延伸的表現。相應地，和老同學、以前要好的同事這些關係聯繫，則更多地依賴於手機和互聯網這些通訊技術。

## (三) 社會網絡的個人化趨勢：削弱還是擴張？

在上文中，我們探討了手機在維繫父母—子女、夫妻或親密關係、好朋友等幾種強關係中的作用。手機等新媒介使這類傳統的強關係處於隨時可被激活的狀態，並在客觀上使人們有更多機會和不常見面的朋友進行溝

手機使傳統的強關係處於隨時可被激活的狀態，並在客觀上使人們有更多機會和不常見面的朋友進行溝通，這就在客觀上為社會網絡的擴張提供了支持。

青年受訪者傾向借助新媒介的幫助，尋找、建立或鞏固新的社會關係，其中手機成為鞏固這些弱關係的有效工具，也是虛擬社會關係向現實層面延伸的重要指標。

通，這就在客觀上為社會網絡的擴張提供了支持。

手機號碼儲存的數量是個人社會網絡規模的側面體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個人社會關係的廣度。在這次調查中，受訪者的手機存有0到400個以上的號碼不等。除了低收入受訪者外，其他受訪者幾乎都存有100個以上的電話號碼。而小餐館領班、小飯館老闆、自行車修理工這些受訪者，儲存的號碼則在30個以下。儲存號碼的數量與受訪者手機話費正向相關。上述這些低收入的受訪者，月話費在十幾元到五十元之間，其他受訪者的話費從八九十元到四五百元不等。費用較高的受訪者通常享有手機費報銷或部分報銷的福利。那麼，除了業務關係和上述提到的強關係之外，這些受訪者如何擴展他們的社會網絡，又會利用手機和哪些社會關係進行互動和交往呢？

在調查中，我們看到其中有一種建立在共同興趣和愛好基礎上的新型社會關係，這在青年受訪者中尤其普遍。他們主要通過互聯網，並以手機為輔助手段，在虛擬和現實層面維繫和發展這些擴展的社會關係。一位28歲的技術人員這樣描述他的經歷：

(我有不同的社會圈子)圈子裏的人當然認識了，圈子外邊的人當然就不認識……比如說，我唱歌一個圈，然後我單位一個圈，他們兩個就不可能有交集呀，對吧，平行……前一陣，我挺煩的時候，老跟他們(唱歌的圈子)唱歌去，一會兒錢櫃，一會兒樂聖，一會兒麥樂迪……這撥朋友是……我在一個「伴我出遊網」裏認識的，一堆唱歌的朋友，就是平常愛唱唱歌，愛爬爬山，經常下下棋，玩玩「殺人」@……

軍棋也有一個圈子……還有玩《傳奇》認識的……現在來說，通過網絡認識的人還是挺多的。因為畢竟平常我這個，平常我接觸的人還是挺少的。(我和這些人)最開始在網上。然後大家就覺得談得來。和則聚，不合則散，談得來的話，就聚聚唄，而且這種朋友沒有甚麼，不牽扯甚麼利益。大家就是好和好散，就是跟你能玩到一塊兒，咱就一塊兒聚唄。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類依靠互聯網，以興趣和愛好為根本出發點而建立起來的社會關係體現的是消費文化中即時享樂的思想。不同於傳統的全方位人際交往，在這類關係中，歷史和未來變得無足輕重，人們在一起為的是尋找快樂的時光，「合則聚，不合則散」成為準則。這種單一維度的新型社會關係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互聯網的擴散。正是互聯網為有着不同生活背景的人們提供了跨越物質界限的溝通橋樑，使這種基於愛好和興趣的個人化社區得以建構。然而，單一維度的社會關係在強度上必然不同於多維度的社會關係，而單一維度社會關係數量的增加，會對社會網絡的整體強度起到某種削弱的的作用。這也正是社會網絡個人化所面臨的兩難選擇。

當然，儘管在受訪者中出現了社會網絡的個人化趨勢，但是不同的受訪人群，也表現出不同的特徵。青年受訪者更傾向借助新媒介的幫助，尋找、建立或鞏固新的社會關係，其中手機成為鞏固這些弱關係的有效工具，也是虛擬社會關係向現實層面延伸的重要指標。此外，他們也會借助手機、MSN等方式維持和發展在現實生活中結識的新關係。在青年組中，

雖然傳統意義上的強關係仍舊是其個人社會網絡的核心構成，但是各種拓展的新關係、弱關係也大量出現，它們建立的基礎表現為功能、情感或娛樂等多種需求。

在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中年組中，也出現了個人化社會網絡的擴張趨勢。然而，這些收入較高的中年受訪者很少通過互聯網直接形成上述的「社交圈」，儘管新媒介是他們維繫新關係和弱關係的重要工具。此外，他們也會利用MSN、通話和短信的方式鞏固已經建立起來的穩定關係。與青年組類似，在他們的社會網絡中，既存在傳統的多維度相交的社會關係，即家人、好朋友、老同學等，也存在着一對一的單維度交往的社會關係。然而，在低收入的中年受訪者中，社會網絡則更多地停留在傳統的關係模式上，個人化的擴張趨勢並不明顯。

## 四 結 論

正如佛圖納提 (Leopoldina Fortunati) 所說，「手機的目的是可以被……我們希望與之交流的人……聯繫到」<sup>⑳</sup>。手機所具備的這種「選擇性社交」<sup>㉑</sup>的特徵與網絡化個人主義的本質十分吻合。手機的普及加快了「個人社區」的出現，使個體建立了以自我為核心的發散式的社會網絡，儘管這一趨勢在不同的人群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現。與此同時，傳統的多維度的社會關係仍舊是受訪城市居民社會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這些受訪者，特別是青年受訪者或收入較高的中年受訪者，在手機的協助下，在處理各類社會關係時表現出相當的能力和技巧。

手機中儲存的大量電話號碼，也在客觀上預示着城市正在逐漸從「空間緊湊、密切交織」的社區模式向超越物理限制的、「構成鬆散的」社區模式轉變。

在這種背景下，以家庭為代表的私人空間出現了個人化的趨勢。在中國傳統意識中，「家庭」作為相對獨立的私人空間，保護家庭成員遠離外部世界的紛擾。在新媒體出現之前，家庭內部主要通過固定電話與外界取得聯繫。由於固定電話指向的是物理場所，所以這種連接是場所對場所的模式。然而，手機、互聯網採用的則是個人對個人的連接方式。利用新媒介，家庭成員可以直接作為個體與家庭以外的關係進行聯繫。這一過程不僅體現了個人在社會網絡中主動性和控制力的增強，也意味着新媒體正在穿透「家庭的圍牆」，將共享的私人空間割裂為家庭成員的個人空間。這種私人空間被個人化的過程是社會網絡個人化向家庭領域滲透的表現。

家庭關係之外的社會網絡同樣經歷了個人化的過程。對中國城市居民而言，最好的朋友和好朋友通常是由同學、戰友、同事、鄰里等關係發展而來的。這些強關係幫助人們彼此全面地了解對方的生活，在生活中有很多交集，也是相互提供情感、物質幫助的主要來源。這類社會關係具有多維度、全方位的特點。然而調查顯示，男性受訪者和高收入的中年受訪者並不經常和最好的朋友見面，即使通過電話、短信等方式的溝通也並不多。這類似於威爾曼所謂的「遠距離的親密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人們通過較少的接觸確認了關係的存在，使這種關係具有隨時可被激活的潛能，以備不時之需<sup>㉒</sup>。但是，對大多數受訪者而言，「最好的朋友」通常也

手機的普及加快了「個人社區」的出現，使個體建立了以自我為核心的發散式的社會網絡。與此同時，手機中儲存的大量電話號碼，也在客觀上預示着城市正在逐漸從「空間緊湊、密切交織」的社區模式向超越物理限制的、「構成鬆散的」社區模式轉變。

居住在北京，物理距離並不是溝通減少的原因，「工作忙」是他們的解釋。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進程中，由於生活節奏加快，生活壓力增加，建立在全方位交往基礎上的傳統的強關係逐漸萎縮為建立在需求基礎上的友誼，多維度的社會關係被削弱了，甚至向單維度的社會關係轉變。與此同時，依賴於手機、互聯網等新媒介的發展，建立在需求或興趣之上的單維度社會關係，也正在成為人們社會網絡中的重要部分。特別是在青年受訪者和中年高收入人群中，新關係、弱關係的不斷出現是個人化社會網絡不斷擴張的結果和表徵。

以手機和互聯網為代表的通訊技術，使人們能夠更加自由地建立起以自身為核心的、廣泛的社會網絡。然而，個人化社會網絡的擴張意味着弱關係的增加，而全方位的強關係則相應地被削弱了。由於資源的限制，社會網絡的橫向擴張往往伴隨着縱向的收縮，社會網絡的穩定性在整體上被削弱了。這種兩難選擇恰恰反映出網絡化個人主義「機會和脆弱」的兩極。在新媒體時代，我們不僅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實現了「身體的延伸」，同時也面臨着更加多元、複雜的選擇。最後應該指出的是，我們的研究基於深度訪談，目的是揭示深層的社會關係。其結果不能也不應該推廣到我們訪談對象之外的群體。

#### 註釋

① 張文宏、李沛良、阮丹青：〈城市居民社會網絡的階層構成〉，《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6期，頁1-10。

② 邊燕杰、Ronald Breiger、Deborah Davis、Joseph Galaskiewicz：〈中國城市的職業、階

層和關係網〉，《開放時代》，2005年第4期，頁98-118。

③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no. 3 (1985): 481-510.

④ 孫立平：〈「關係」、社會關係與社會結構〉，載《轉型與斷裂：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頁246-70。

⑤ 截至2006年底，北京互聯網普及率為30.4%，手機普及率為97.5%。分別參見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07年1月），www.cnnic.cn/uploadfiles/pdf/2007/1/23/113114.pdf；北京市統計局：〈社會經濟綜合指標〉（2007年1月），www.bjstats.gov.cn/lhzi/cbtj\_2006/200701/t20070122\_83931.htm。

⑥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Leopoldina Fortunati, "Italy: Stereotypes, True and False", in *Perpetual Contact: Mobile Communication, Private Talk, Public Performance*, ed. James E. Katz and Mark A. Aakh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42-62; Kenneth J. Gergen, "The Challenge of Absent Presence", in *Perpetual Contact*, 227-41.

⑦ Caroline Haythornthwaite and Barry Wellman, "Moving the Internet Out of Cyberspace: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An Introduction", in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ed. Barry Wellman and Caroline Haythornthwait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1-41; Barry Wellman, "Little Boxes, Glocalization, and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in *Digital Cities II: Computational and Sociological Approaches*, ed. Makoto Tanabe, Peter van den Besselaar, and Toru Ishida (Berlin: Springer-Verlag, 2002), 10-25.

⑧⑨ Caroline Haythornthwaite and Barry Wellman, "Moving the

Internet out of Cyberspace: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An Introduction", 34; 33.

⑨ John P. Barlow, "Is There a There in Cyberspace?", *Utne Reader* (March-April 1995): 50-56; Storm King, "Analysis of Electronic Support Groups for Recovering Addicts", *Interpersonal Computing and Technology: An Electronic Journal for the 21st Century* 2, no. 3 (1994): 47-56; Robert Kraut et al., "Internet Paradox: A Social Technology that Reduces Social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3, no. 9 (1998): 1017-31.

⑩ James R. Beniger, "Personalization of Mass Media and the Growth of Pseudo-communi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14 (1987): 352-71.

⑪ Barbara Adam, *Timewatch: The Social Analysis of Tim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Frances Cairncross, *The Death of Distance: How the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Will Change Our Live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

⑫ David Constant, Lee Sproull, and Sara Kiesler,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The Usefulness of Electronic Weak Ties for Technical Advice", *Organization Science* 7, no. 2 (1996): 119-35; Martha S. Feldman, "Electronic Mail and Weak Ties in Organizations", *Office Technology and People*, vol. 3 (1987): 83-101; Shingo Dobashi, "The Gendered Use of Keitai in Domestic Contexts", in *Personal, Portable, Pedestrian: Mobile Phones in Japanese Life*, ed. Mizuko Ito, Daisuke Okabe, and Misa Matsuda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5), 219-36; Howard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London: The MIT Press, 1994); Barry Wellman and Milena Gulia, "Net Surfers Don't Ride Alone: Virtual Communities as Communities", in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Life in Contemporary Communities*, ed. Barry Wellm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331-66.

⑬ Rich Ling, "Mobile Telephony, Mobility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Everyday Life" (Paper presented at Machines that Become Us Conference, New Jersey, 18-19 April 2001).

⑭ Mary R. Lind and Robert W. Zmud, "Improving Inter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through Voice Mail Facilitation of Peer-to-Peer Relationships", *Organization Science* 6, no. 4 (1995): 445-61.

⑮ John P. Robinson and Geoffrey Godbey, *Time for Life: The Surprising Ways Americans Use Their Tim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teve Coffey and Horst Stipp,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omputer and Television Use",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37, no. 2 (1997): 61-67.

⑯ Barry Wellman and Milena Gulia, "Net Surfers Don't Ride Alone", 331-66.

⑰ Barry Wellman, "The Community Question: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no. 5 (1979): 1201-31; Barry Wellman and David B. Tindall, "How Telephone Networks Connect Social Networks",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Sciences*, vol. 12 (1993): 63-94; Barry Wellman and Scot Wortley, "Different Strokes from Different Folks: Community Ties and Social Suppor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 no. 3 (1990): 558-88.

⑱ Caroline Haythornthwaite, "Strong, Weak, and Latent Ties and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8, no. 5 (2002): 385-401.

⑳ Kenichi Ishii, "Internet Use via Mobile Phone in Japan",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8, no. 1 (2004): 43-58; Manuel Castells, Mireia Fernandez-Ardevol, Jack Linchuan

Qiu, and Araba Sey, "The Mobile Communication Society: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Available Evidence on the Social Uses of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 research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 Policies and Prospects: A Global Perspective, Los Angeles, 8-9 October 2004).

㉑ Kenichi Ishii, "Internet Use via Mobile Phone in Japan", 43-58.

㉒ Leopoldina Fortunati, "The Mobile Phone: Towards New Categorie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 no. 4 (2002): 514-28; Misa Matsuda,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Selective Sociality", in *Personal, Portable, Pedestrian*, 123-42.

㉓ Shingo Dobashi, "The Gendered Use of Keitai in Domestic Contexts", 219-36; Leopoldina Fortunati, "The Mobile Phone: New Social Categories and Rel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Sociale Konsekvenser av Mobil-telefoni', Oslo, 16 June 2000); Rich Ling, "Direct and Mediated Interaction in the Maintenance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Home Informatics and Telemati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ed. Andy Sloane and Felix van Rijn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0), 61-68.

㉔ Manuel Castells, Mireia Fernandez-Ardevol, Jack Linchuan Qiu, and Araba Sey, "The Mobile Communication Society".

㉕ Barry Wellman, "Physical Place and Cyberplace: The Rise of Personalized Network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5, no. 2 (2001): 227-52.

㉖ Barry Wellman, "Little Boxes, Glocalization, and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10-25.

㉗ Angel Lin and Avin Tong, "Mobile Culture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er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Asian Modernities II: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ools & Social Changes in Asia, Beijing, 20-21 October 2005).

㉘ Shingo Dobashi, "The Gendered Use of Keitai in Domestic Contexts", 219-36.

㉙ Kenneth J. Gergen, "The Challenge of Absent Presence", 227-41; Leysia Palen, Marilyn Salzman, and Ed Youngs, "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 in Everyday Life", *Personal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5, no. 2 (2001): 109-22.

㉚ 參見 Yuen Sun-pong, Law Pui-lam, and Ho Yuk-ying, *Marriage, Gender, and Sex in a Contemporary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M. E. Sharpe, 2004)。

㉛ Patrick Law, "Mobile Communication, Mobile Networks, and Mobility: The Case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er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Asian Modernities II: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ools & Social Changes in Asia, Beijing, 20-21 October 2005).

㉜ 「殺人」為一種集體娛樂遊戲。在每場遊戲中，設有一位法官，一個殺手，其他的遊戲者通過互相問答，猜出殺手是誰。

㉝ Leopoldina Fortunati, "Italy: Stereotypes, True and False", 51.

㉞ Misa Matsuda,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Selective Sociality", 123-42.

㉟ Barry Wellman, "The Community Question", 1201-31.

蓋博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博士研究生

楊伯淑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教授